

萬仲文著

中國外交之史的分析

廣西建設研究會叢書之五

廣西建設研究會出版

萬仲文著

廣西建設研究會叢書之五

中國外交之史的分析

廣西建設研究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月初版

廣西建設
研究會叢書
中國外交之史的分析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伍角

編著者 萬仲文

出版者 廣西建設研究會

桂林桂東路八桂廳

發行人 廣西建設研究會

印刷所 科學印刷廠

桂林西成路五號

代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
翻印必究

本叢書編輯例言

一、本會爲促進民族文化，適應抗戰及建設之需要起見，決定出版各種學術專著，名爲廣西建設研究會叢書。

二、本叢書著作範圍，約如下列：甲、闡明孫中山先生遺教理論方面或計劃方面之專著，乙、各種哲學科學之專著，具有發揚孫中山先生遺教之價值者，丙、闡明廣西省建設事業理論方面或計劃方面之專著，丁、各種學術著譯對於抗戰問題或廣西建設問題之研究，切合參考者，戊、文藝作品，具有發揚民族精神，或普及建設認識之社會價值者。

三、本叢書稿件，除由本會研究員著作外，爲提倡學術，鼓勵著作起見，對於會外人士之投稿，亦一律歡迎。

四、凡編入本叢書之著作，皆係按其性質經由本會研究專家審查合格者，惟爲尊重學術研究之自由，本會對各著作之內容，並不刪改，故文字責任，仍由著者自負。

廣西建設研究會識

序（代叢書編者弁言）

仲文先生這本研究中國外交史的著述，很使人感覺滿意。

第一是經緯整然。把歷史畫分階段，是必要的，然而困難的事。因為歷史之構成，由於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如果不能在這些複雜微妙的關係中，抓著中心，便無從畫分；如果勉強畫分，就會使每一階段中所包含的現象，諸多矛盾，不能自圓其說。這本書之縱的畫分，是適當的；橫的排列，是配合的。我們看過之後，對於百年來中國國勢的演變及依據國勢而產生的外交歷程，瞭如指掌。不用說，這樣經緯整然的歷史的著述，絕對不是不經過苦工而可以達成的；因為，僅僅在外交史料的圈子里來編寫外交史是不能表現出其所以然的，必須對於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的情況作過綜合的研究，有了澈底的認識。

第二是評價公平。史論者往往以最高的理想批評某一件事的結果，因而對於一件事之是非功罪或一個人之智愚賢不肖，就很少能夠評論中肯。至於以一己之好惡來定得失，更不足道了。這本書沒有

忽視那足以決定某一事件之當時大勢和某一事件之種種牽制，故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所獲得的評價是公平的。自然，如果不是對於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的情況作過綜合的研究，有了澈底的認識，雖欲公平而不可得。

這本書的優點自然還有，上述兩點不過是舉其最重大者而已。此外，我們看過這本書之後，似乎不免發生這樣的感想：百年來中國之所謂外交政策，就因為不是以保衛國家民族的利益爲目的，而是以維持某部份人的權位爲目的，故不管強硬也好，屈服也好，戰也好，和也好，均無好結果；這是最足以使人警惕的。

仲文先生治學甚專，未來之成就，實無可限，此書不過是新酬初試而已。

二十九年十月李任仁

自序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我開始在上海過着報紙雜誌記者的生活，從事於寫評論的文章，也寫關於國內政治的文章，也寫關於國際外交的文章，但兩者都僅憑直覺的論議，尙沒有自覺的深刻的研究。民國廿三年我由上海到廣西來服務，那時日本侵華愈急，而舉國尙無足以令人滿意的明確的對日外交國策，還在鬧什麼「敵乎友乎」的問題，大家便感覺到非常苦悶，即一般實際負責的人也不能自遣。我當時反省這苦悶的由來，都是因爲大家對於日本的外交沒有源源本本的認識所致，於此在一種「懷遇不才」的自愧自勵之下，才節衣縮食，儲蓄薪水，自覺自主地決心於來年到日本留學，專門研究日本外交史。到了民國廿四年八月，這個苦願終於僥倖實現了，許多朋友都爲我慶幸，但其中有些老熟的朋友，替我個人打算，却都勸我改變宗旨，研究財政經濟，以求實利，我則毅然婉謝，仍舊抱定原來的研究志願和興趣。

是年九月，我到了日本東京，當即謝絕交遊，埋頭苦幹，專力於學習日文，差幸日文稍有根底，

加上特別勤勉，所以進步更快。半年以後，我便參加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院的入學考試，考試得很嚴格，結果被錄取的，僥倖只有我一個人。五月入學，在神川彥松教授指導之下，除聽講外，當即着手於日本幕末外交的研究，到了七月，在兩個月的短期間裏，居然寫成研究筆記稿約十萬言。暑假中，到北條海濱避暑，閒裏偷忙，讀了若干英文外交史書籍及日本政治外交家的傳記，其中也有許多前所未知的外交史料。九月回到東京，仍舊從早到晚，風雨無間的，天天把瘦軀塞在研究室的鵝絨軟椅上，着手於明治時代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因為用功過急，坐寫過度，便把健康弄壞，患了一種由神經痺弱而來的坐骨神經痛；但我本着一種達摩面壁的精神，完全不去理它，一口氣苦幹下去，到了十二月，健康愈壞，腰也彎了，背也硬了，面黃骨瘦，見者都爲之寒心，上至教授下至研究室的事務員都勸我休息，我只有慘然一笑置之，而其結果，我又收穫了研究筆記稿約二十萬言，其中包含明治初年的日本自主外交和甲午戰役前後中日兩國的外交。民國廿六年開始時，我的身體實在支持不了，自己也有些害怕起來，好幾次想中輟研究工作；但其時中日關係已越弄越緊，戰爭隨時有爆發的可能，我害怕因此半途廢學未竟全功的心理，比害怕自己的病體還利害，所以又迫得爭取時間，不顧身體如何，仍舊加速度的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到了七月，又寫成日俄戰爭與日英同盟外交及廿一條件外交

的研究筆記稿約二十萬言。至此總算把日本外交史從幕末開國至第一次歐戰，有系統的全部研究過一番，雖然犧牲了不易補救的健康，但換得的是自己對於中日外交已有了相當自主自信的認識，不負苦心留學的初衷，覺得非常欣慰。及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大多數的留學生都匆忙歸國，我還留在東京，整理筆記稿，並以餘力詳研戰時國際法，決定非事態演至十二分惡化，絕不離開我的舊壘——研究室。到了八月初旬，報載白健生先生已由桂飛京，策劃抗戰，我根據過去的政治經驗，已知道情勢緊急，不久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序幕果然揭開，我也不得不於八月下旬離開東京，盡挾我那五十萬言的筆記稿和數百種書籍，毅然歸國。

回到桂林後，健康更壞，身心的痛苦，頓覺比從前厲害，乃照預定計劃，作長期的休養。廿七年以後，住在八桂廳廣西建設研究會編譯室裏，一面養病，一面補行研究中國的開國外交，迄六月得筆記稿約六萬言，其後因為忙於不得已的公務，致病體再不能支持其他工作，便把研究工作中斷了多時，但仍念念不忘於我歸國後的座右銘——養病第一，著述第二，問世第三。廿八年冬，承國立廣西大學校長故馬君武博士之聘，在該校政治系第三年級講授中國外交史，才陸續地根據以前的研究筆記稿，編成講義綱要，這便是本書的初稿，但內容仍欠完備。今年六月，忽遭子瘍父喪的大變，心灰意冷

，乃下鄉幽居，閉門不出，月餘後精神漸漸恢復，鄉居多暇，便將講義內容，加以修改補充，成爲本書，改名爲：「中國外交之史的分析」。

以上略述我個人研究外交史和編著本書的經過，以誌本書之因緣。自愧爲學力和體力所限，本書的內容，不敢說有什麼了不得的貢獻，其出版不過是作爲個人長期研究工作的紀程碑，作爲被犧牲了的健康之唯一慰安品，並以之謹獻慰於先父之靈。

末了，我很感謝李德鄰白健生黃旭初三先生，因爲他們對我優遇，賜給我留學和研究的機會。還有前梧州區民團指揮官陳良佐先生和前昭平縣長葉傑彪先生，在我回桂途中所乘的電船觸礁沈沒之後，替我把那心血換得來的五十萬言筆記稿和四箱書籍，打撈起來，很完整地送回我，使我得以參考，編成此書，隆情高誼，永念不忘，亦在此誌謝。

敘例

一、本書係一種嘗試的歷史研究，而非單純的歷史記述，所以內容側重於史實的綜合分析，以明其原因、真相、關係、影響等等；至於史實的平鋪雜錄，則坊間此類書籍已多，故不重贅。

二、本書應用國際政治史學的方法，把外交史作為政治史的一部門來研究，所以（一）研究內容限於重大的外交事件，即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上有根本重大的影響者；其他瑣碎的枝葉的外交交涉，則概行省略。（二）對於重大的外交事件，側重於政治的縱的研究和橫的分析，如內外情勢之演變（尤着重於日本），外交方針之決定，外交策略之運用等，皆加以系統的扼要的說明；至於流水賬式的交涉經過及癩祭魚式的史料彙錄，則均省略。（三）多提供值得注意的觀點和材料，少敘述已習知的故事。

三、因此，本書在形式上力求精要和明快，既不像一般原料的書籍，卷帙浩瀚，使讀者茫無頭緒，也不像一般通史，過於粗簡，使讀者不生深刻印象。同時在精神上，則一貫的站在客觀的民族主義

的立場，對於中國外交，作一種合理的分析和解釋，而不流於一般自暴自棄的譏諷和嘆息。——這可說是本書的個性之一。

四、本書關於史實的研究分析，盡力取客觀態度，但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分析所至，勢必議論隨之，主觀的成分，自知仍然不免，這是不能自己的事，也許本書有一得之處即在於此，但因此而有膚淺謬誤之處，亦在所難免，甚望方家指正。

五、本書原爲講義綱要，頗合大學政治系中國外交史教程之用，大約每一小段可講一小時，一年可講完。至於每段的說明材料，皆可順序於章末參考書籍中取得之。

六、爲便於讀者參照起見，特於章末附錄有關之條約原文摘要，並於書末附錄百年來中國外交年表。

緒論

一、研究外交史的意義

外交也和戰爭一樣，是一國政治的延長，是大勢決定。所謂「勢」，就是國家活力的對外作用，此「勢」有其來源，有其趨向，不是一時的突變，而是長期的演進。在此演進的過程中，明白它的過去，自然可以測定它的將來，因為將來是受着過去的諸因素所決定，斷非少數人可隨意操縱的魔術。有些人以為外交只是一種欺騙和陰謀，是一種縱橫捭闔的手段，遂視外交為因人而異不可捉摸的東西，那只是說到外交的運用，而非外交的本體。因此，歷史的事件雖然不是循環的，但是各國外交的方針多有其傳統性可覆按，從而研究過去的外交史實，雖然不能成為我們的絕對教訓，但足為我們辦理外交或評論外交時的貴重參考和有力的根據。因為國民性、社會結構，和地理關係，是構成一個外交方針的重要因素，而國民性、社會結構，和地理，是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也很少變化，所以外交

方針便有傳統不變的。想認識此種傳統的外交方針，首先我們就要研究外交史；近代已有過許多政治家外交家，靠了他們豐富的外交史知識做指南針，而獲得他們在外交事業上的成就。

二、中國外交史的概念

過去用外交史 (Diplomatic history) 之名，含義甚狹，因為「外交」Diplomacy 一語，源出於希臘，原為一種對外接洽的官吏之二聯身份證明書，望文生義，很容易使人誤會外交史僅僅是外交官的活動史。因此最近學者間多改用國際政治史之名，(International political history)，頗足以更新一般人對於外交史的觀念。所謂國際政治史，就是記述國際社會間的權力鬥爭的歷史，所以中國外交史也就是中國在近代國際社會間的權力鬥爭史；而近代國際社會是一個帝國主義支配下的社會，所以中國外交史也就是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史，而應以鴉片戰爭為中國外交史的開端，因為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有的是國際交通史而非國際政治史。

三、研究外交史的方法

在基調上應該運用經濟史觀，所以研究中國外交史不但要明瞭各時代的外交事件，還要究明事件之國際的社會的經濟背景，而解釋其因果關係，指出其將來的發展性。可是解釋歷史的經濟的因果關係，並不是外交史研究的全部任務，而是任務之一，此外我們還要研究：（一）政治、文化、社會的諸情勢，（二）政策和交涉，（三）人物的因素等等。因為文化在社會上占最高地位，有指導的作用；政治握社會上最大權力，有支配的作用；而經濟關係對社會不過有基礎的決定作用，其感受性最敏速普遍而已。外交為綜合而複雜的社會現象，尤非只從一方面所窺其全貌。故最近國際政治史學者的研究方法論，要有二義：（一）把外交史作為整個人類社會政治生活中互相交涉的某一時間和空間的事象之研究。（二）國際政治史學是一般政治史學的一部門，它和一般政治史學應該立於同一的立場上，是一種綜合的純粹科學的研究。因此，作為一個國際政治史學者，應該：（一）屏除國家民族的偏見，超然於國家感情及利害關係之上；（二）排斥歷來於事後對人對事的是非成敗之傳統史論的方式；（三）揚棄一切研究動機上的功利主義，以免影響及客觀的史實；（四）脫離一切機械論者的史觀範疇。

四、中國外交史的再認識

基於以上論列，著者個人對於近代中國外交史的認識，有若干點與歷來的研究者不盡相同。例如：（一）在世界史的觀點上，把中國近代外交史積極地看做一部對外抗爭史，而不消極地看做對外屈服史。（二）在中國近代政治史及文化史的觀點上，把近代中國外交政策及其活動，認為是一種自然的合理的存在，而主持外交及担任外交的人物，大體上皆為已盡其最善的努力者。（三）因此，中國近代對外交涉的諸結果，實為一種民族社會有機體生活之必然的演變，一切成敗是非的俗論，並無特別加以重視之必要。更端言之，即：

1. 在性質上，把中國外交史看做一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百年鬥爭史。——是盡力鬥爭的而非單純屈服的；相當主動的而非完全被動的。

2. 在鬥爭的對象上，把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這一過程看做對歐洲帝國主義的鬥爭時代，甲午戰爭以後，直至現在抗戰這一過程，看做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時代。因為對象不同，敵人各異，所以鬥爭的方式也有別，後者是曲折的長期的。

3. 在鬥爭的手段上，把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入北京這一過程看做戰爭主義時期（用武力），把以後的時期看做非戰主義（和平協調的）時期。

4. 在鬥爭的目的上，把鴉片戰爭直至對英法聯軍戰爭這一過程看做整個的開國外交時代，由咸豐十年至甲午戰爭這一過程看做整個的護邊外交時代；前者是為保存優越的國際地位及通商制度而鬥爭的時代，後者是為保存邊疆藩屬的領土主權而鬥爭的時代。而從甲午戰爭至今，則看做整個的圖存外交時代，是為保存本國領土主權及生命線而鬥爭的時代。

把握了上述各點的新認識，我們對於全部中國外交史，才有一個明瞭的確實的系統概念。

本章參考書：

- 一、石井菊次郎：外交餘錄第二編外交私觀（國民公論）
- 二、松原一雄：外交與外交史的研究
- 三、拙著：由抗戰外交到建國外交（國民公論一卷六期）
- 四、神川彥松：東京帝國大學外交史講義